

居游之间

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

环境治理与生态权益论丛

HUANJING ZHILI YU SHENGTAI QUANYI LUNCONG

王俊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环境地理与生态效益论丛

居游之间

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

王俊敏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游之间: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王俊敏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2

ISBN 978 - 7 - 5426 - 4517 - 3

I. ①居… II. ①王… III. ①游牧—民族文化—文化研究—中国②狩猎—文化研究—中国③捕捞—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②K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562 号

居游之间——游牧、采猎、渔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

著 者 / 王俊敏

责任编辑 / 杜 静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9.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517 - 3/G · 1306

定 价 / 69.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马戎

序言

除了南极洲以外,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地几乎遍布其他大洲的所有角落,这些居住地在地理、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方面千差万别,在如此不同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也逐步形成了当地人群的特定经济活动类型、生活方式和相应的文化模式。在普及型的读物中,通常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类型归纳为一个线性的发展链条:首先是猎取野生动物(包括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的采猎经济,然后随着野生动物的驯化在草原地区出现了家畜和畜牧业,而伴随野生植物的改良在平原地区出现了耕作农业和家禽、家畜,食品的大幅增产为人口增加和定居创造了条件,农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催生出工业。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简化和线性进化的路线图,各地人类社会的实际演变情况绝没有这样简单。在一些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的地理边缘地带(如北极冻土地区、荒漠戈壁地区),当地人群仍然延续着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在各种自然条件的交汇地带也会出现不同经济活动交互融合的组合方式(如半农半牧、半林半农经济),同时,不同经济模式之间的融合渗透、不同文化传统人群之间的互动融合又进一步使各地的经济与文化生态进一步多样化,这些发展态势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多彩斑斓的经济与文化图像。

人们在研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时,通常对于当地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语言文化模式给予大量关注,但是对于形成这些模式的生态体系以及生态系统与当地经济模式、社会模式之间的关系则较少进行讨论。因此,王俊敏的新书《居游之间——游牧、采猎、渔

捞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可以说是把地区生态体系、人的经济活动、人的社会活动三者综合起来予以统筹分析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对概念：“游文化”和“居文化”。他认为：“各种文化类型可进一步归入游文化和居文化两个大系，其中采猎、渔捞、游耕、游牧四型文化属于游文化，精耕文化属于居文化”。考虑到不同经济模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作者也提及“‘游’和‘居’两种文化混合而成的、独立的第三种文化即‘居游之间’”。作者敢于提出这样的新概念，这一勇气首先是需要加以肯定的，学术研究的精髓就在于敢于创新，勇于思考。至于这两个相对应的“文化”概念的内涵是否清晰，以及他提出“游文化显然比居文化丰富多样，悠久绵长，因此可以说，多样化的游文化是与大多数生态系统更相适应的，生态多样性也主要依赖游文化的多样性而得到维护。游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因此而非比寻常”这一判定是否会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些都可以留待日后学术界的交流与讨论。

作者在书中批评了“长期以汉族定居农耕文化为正统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因为这种观点和倾向转化为实践，对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极其有害的”，对于这一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不同族群的经济活动模式和文化多元性，这在今天以 12 亿汉族人口为主导的中国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格局，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格局和文化模式格局的基础。全书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中，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机制：一个是“单面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现代化进步观”的话语支配，一个是我族群与他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的制度安排。这个视角也具有启发性。当我们讲到“制度安排”时，实际上也超越了文化模式的讨论而涉及到政治制度，这与我近些年关于对我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的提议也有一定的关联。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几个独立的部分，分别介绍了作者在不同类型地区开展的社区调查，介绍了与采猎、渔捞、游牧三类“游文化”模式相关的基层村落中人们的生活。同时，作者与村民和当地干部的

对话也使读者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当地人的实际生活,生动地反映出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书中有些章节提供了一些量化的数据和详细的描述,带有社会学、人类学调查报告的色彩。涉及的题目包括蒙古族地区的草场退化、封围禁牧、生态移民、草场征用、人口流动,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地区的禁猎转产、养鹿业和木耳段种植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太湖地区捕捞渔业的历史演变、禁渔区和禁捕期的实施、网围养殖大整治与渔民生计再转型、退垦还湖与整村搬迁。书中展现的社区个案和生动的对话,为那些对这些地区基层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模式和发展历程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研究素材,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的制度转型、政策转变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以及当地人对这些变化的看法。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社会整合与经济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和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使政权建设、商品经济和人员流动渗透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各边疆地区无论是带有“游文化”还是“居文化”特征的传统经济和文化模式都很难避免被逐步整合进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体系中来。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能够避免出现作者所担心的“单面线性进化论”和“现代化进步观”主导的发展局面,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我比较熟悉的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区为例,过去一直延续了传统的游牧经济与生活模式,公社化以后把畜群的游牧地域限定在大队的范围之内,实行家庭承包制后把牲畜和草原完全分给牧民户,各户草场因水源问题划分成与河流交叉的窄长条,不仅割断了原有的道路体系,边缘部分的草场也难以充分利用,牧民普遍建房定居,小学向县城集中,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尽管地理生态系统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草原畜牧业和牧民社区今后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如果放在生态系统、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模式这三个系统的互动框架中来分析,“游”与“居”之间出现了怎样的转化与演变?

随着国家林业部门的大量砍伐和人口增长,我国东北部地区的原始森林也已经今非昔比,当地的野生动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国

家法律保护的对象,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鄂伦春人传统的狩猎经济已不可能延续,但是在当地的生态条件下,熟悉传统狩猎技能和生活方式的猎民们的“转产”遇到极大的经济与文化障碍。新型林业经济(生态旅游、动物养殖、森林野生植物栽培等)可能是一个能够继续发挥林区居民传统知识技能的用武之地。

随着人口增长的工业化发展进程,过量捕捞和大量的工业、生活污水排放已经使我国许多重要江河湖泊(包括太湖)的传统水产业面临绝境,如何能够使这些江河湖泊能够再次生产出没有受到污染的鱼类和其他水产品(虾蟹、菱藕等),可能是一个远比短期内当地工业产值更为重要的新任务。本书中讨论的许多议题,也都与这一任务密切相关。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高原、沙漠、平原、戈壁、草原、山区、绿洲、湖区、海岛、森林、湿地等地貌,各地的地理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在不同生态环境中产生的各类经济模式都有其适合当地生态系统的特点,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宝贵历史遗产,我们今天必须特别珍视和精心继承。在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发展大潮中,我们需要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具有不同传统和文化特色的经济活动吸收和结合进中华民族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因此本书中介绍的各种地方性、族群性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传统,不能简单地把欧美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楷模而盲目抄袭。在这个历史时期,也更加需要我国学术界去关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区域性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把它们描述出来,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使大家对中华民族的多元灿烂文化传统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使大家更自觉地关注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俊敏的这本书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前言

思路和内容

人一生会关注很多问题,学人一生也会有多方面的学术兴趣,但人生有涯,能长期持续关注或保持学术兴趣的问题就有限了。我从二十多年前尝试着踏入学术界以来,一直对两个问题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探究:一个是族群文化变迁和发展问题,一个是生态衰变和治理问题。可是,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探究策略和路径呢?一开始我是有些懵懂的。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萌生了这样明确的想法: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文化与生态双重危机的时代,因而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我所关心的两个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即从特定的族群文化变迁和发展的角度去看生态衰变和治理,从特定的区域生态衰变和治理的角度去看族群文化变迁和发展。从方法论来说,统合“区域”和“社区”两个层次,把“族群文化—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单位,使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①,既适合我所研究的主题,也可以保证方法的可操作性。本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考察内蒙古蒙古族的游牧、兴安岭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采猎、太湖汉族的渔捞这三型游文化的变迁及其与环境变

^① 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以社区为研究单位,进行不同类型的乡村生态社区研究。社区的类型是综合“区域生态系统”、“经济文化类型”和“现代化水平”三类因素划分的,并将其置于社会变迁和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两种研究策略可以互参互补。见拙编《乡村生态社的衰变与治理机制:理论和个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化的相互关系的。

蒙古游牧文化变迁与草原生态重塑部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新型社区的牧区社区研究；作为牧区经济社会史上新生事物的牧民家庭经济研究；青年牧民的生育观念研究；通过对锡林郭勒盟新康扶贫开发移民村和巴音乌拉生态移民嘎查两个个案的跟踪研究，具体展示和探讨蒙古游牧文化变迁与草原生态重塑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对倡导和质疑草原生态建设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的观点进行综述和评价，突出论证人、文化、自然环境相协调和生产、生活、生态相平衡的大生态观；从市场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生态退化、居住方式变化、教育资源市场化和全球化几个维度，分析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相关问题。

兴安岭采猎文化变迁与森林生态重塑部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鄂伦春族与国家关系一体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采猎文化变迁与森林生态演进相互作用框架下研究鄂伦春族生产关系、经济类型、居住方式的变迁及其效应，商品交换的发展及其生态经济限制，进而对采猎经济进行重新解释，探讨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经济；通过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乡和吉登嘎查鄂温克猎民村两个个案，研究鄂温克猎民的生计方式变迁与环境变化的相互影响，并进而与鄂伦春猎民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

太湖渔捞文化变迁与湖泊生态重塑部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考察生态压力下的太湖渔业和渔民生计变迁；透过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自来水污染事件，审视太湖渔业变迁与太湖水污染、太湖综合整治与渔民生计转型的相互影响；重点通过湖村个案研究，具体描述和分析太湖渔捞文化变迁与湖泊生态重塑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

以上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构成了本书的三个篇章。在这三篇中，或明或暗地贯穿着如下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

首先，对作为同一种文化中两种成分的“游”和“居”、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的“游”和“居”、由居游两系文化混合而成的第三种文化即“居游之间”进行了区辨。然后讨论，为什么要从游和居的角度研究文化？游文化和居文化首先是从行走和居住方式（简称“行居方式”）出发来展开讨论的，但又不限于行居方式。从行居方式入手，更容易把

人、自然、文化连接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体系,以便整合生态、生产、生活三大领域,平衡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真正以“大生态”的眼光从整体上透视文化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另外,单从游的角度来看,在各型传统游文化纷纷衰落的同时,当今时代的“流动性”却大大增强了,信息化、全球化似乎就意味着“流动”。那么,传统游文化的变迁与现代流动文化的兴起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

进而讨论,为什么要从游和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并专门考察中国游文化(包括汉族游文化)的变迁?除了上述共同的理由,更为直接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矫正“土”优于“水”、居文化优于游文化的观点,以及长期以汉族定居农耕文化为正统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因为这种观点和倾向转化为实践,对维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极其有害的。事实上,游文化比居文化丰富多样,悠久绵长,多样化的游文化是与大多数生态系统更相适应的,生态多样性也主要依赖游文化的多样性而得到维护。因可以说,各型游文化蕴含着更为丰富深厚的传统生态文明资源,对重建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定居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扩张,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工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崛起,对采猎、渔捞、游耕、游牧各型游文化均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采猎文化已经基本消亡。在新兴的信息文化的冲击下,这种挑战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各型游文化所发生的巨变,可用“居游之间,进退之际”八个字来概括。促发其变迁的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机制:一个是“单面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现代化进步观”的话语支配,一个是我族群与他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的制度安排。

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回答和阐发,便形成了本书的“导论”。而不论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怎样进行研究,本书都一再要试图表明: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互赖相生、衰荣与共的,而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和生态双重危机;居游两系文化所辖的各型文化,均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传统生态文明资源,而凡是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及其良性互动模式,维持生态、生产、生活平衡,兼顾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促进各区域一族群

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及其变迁,就是“好的”、“合宜的”、“文明的”,无所谓高低优劣、先进落后;各区域一族群也只有成功地再造生态平衡,拥有与其相适应的生态文化,才会由哪怕是“原来的落伍者”变为“最后的胜利者”。而这需要国家和各族群真正达到高度的“文化自觉”,以重建中华民族和人类的生态文明为旨归,“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生。

说明和谢辞

这项研究前后已历经二十多年。1988年开始着手考察蒙古游牧文化变迁与草原生态变化,1998年开始聚焦兴安岭采猎文化变迁与森林生态变化,2008年重点转向太湖渔捞文化变迁与湖泊生态变化的研究,合起来正巧是30个年头,每个十年头上侧重研究一个游文化,同时前一个游文化的研究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其中每一个游文化的研究过程,我在每一篇的题记中都做了具体交代。本书就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对上述三型游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研究的一个结集。我的思路 and 观点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而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推进逐步清晰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为尽力避免与已有成果的重复,只探究自认为有价值的论题;但不足是对每个游文化的研究都不够全面和细致,主题不够集中,体例不够统一,加上时间跨度大,甚至在观点上前后也有不完全一致或者重复的地方。这是我首先需要加以说明的。

有许多机构和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做出了贡献。我198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当时分管教学和科研的于金焕副院长,竭力鼓动青年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牧区社区形成、牧民家庭经济、牧民生育观念几个论题的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学院资助实施并完成的。其中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珠和苏木、察右后旗调查时,亦生亦友的白银宝、李瑞宏和牧民吉拉嘎一家给予了我难得的帮助。这也是本项研究的开端,所以特别值得提及。

1996年我转到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和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工作,“采猎”和“游牧”两篇的研究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采猎”篇

的研究主要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现代化过程中小民族发展问题及政策研究——以鄂伦春族为例”(项目批准号 97CMZ002)的资助,该篇的补充调查及修改和“游牧”篇的其他部分研究,主要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经济文化类型的互动、变迁、重塑与区域—民族可持续发展”(项目批准号 02CMZ006)的资助。在两赴大兴安岭林区猎乡调查研究过程中,承蒙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委宣传部及乌鲁布铁、托扎敏、古里三个猎民乡镇,根河市政府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乡,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署民族宗教局,塔河县十八站和呼玛县白银那两个鄂伦春民族乡等单位的支持,特别是何文柱、孙震、孟松林、王绍东、莫日根布库、赵振田、田晓川等领导和友人,以及诸多猎民朋友的帮助。在两赴内蒙古草原牧区调查研究过程中,锡林郭勒盟畜牧局,苏尼特右旗相关部门和朱日和镇,锡林郭勒市欣康村和正蓝旗巴音乌拉嘎查两个生态移民村,鄂温克族自治旗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我的同事阿荣高娃和她的父亲图舍大叔、牧民巴丹苏荣老人一家,魏国楠、浩特、劲松、道日娜、玛尼扎布等各级领导,亦生亦友的周振录、樊远东(还有后来的蒋士杰),以及诸多牧民朋友,给予了热情厚道的帮助。这段时间富有成效的工作,与当时党校分管科研工作的郜良副校长和科研处金瑞处长所营造的良好科研氛围,并给予实质性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密不可分的。

2004年,我从塞北来到江南,调入苏州大学工作,为勘察渔捞文化带来了契机。“渔捞”篇的研究以及“游牧”篇中对锡林郭勒盟生态移民项目个案研究的追踪,主要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环境治理的社区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07JJD840202)的资助。在赴太湖调查研究过程中,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沈振华处长和新湖村朱大海、高阿才两位先生给予了切实的帮助。

上述一系列研究所形成的作品,约有一半已先后陆续发表,其中几篇是与研究同事合作的,几位友人参与了个别文章观点的讨论。这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大多只做了文字上的订正和处理,有几篇则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这些在书中都已经注明。文章的发表得

益于编辑的错爱,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内蒙古大学学报》的采娜和《内蒙古社会科学》的哈布尔两位老师。另有一半为首次发表。

本研究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国勋研究员和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鼓励和敦促。最后,承蒙方世南教授邀请加盟,使本书如期面世;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老师欣然为本书作序,无疑是对学生的奖掖和鞭策。

面对如此多的鼓励和期待,自愧未能把研究做得更好;对于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恕不一一列举。在此,我谨表衷心的感谢!

王俊敏

2013年国庆节于苏州桂花新村

目 录

序 言	马 戎 1
前 言	1
导论:游与居,进与退	1
一、居游之辨	1
二、从游与居的角度考察文化的独特意义	4
三、关于中国的居游两系文化	6
四、关于汉族的游文化	10
五、居游之间	13
六、进退之际	20
七、文化变迁与生态重塑的核心机制	21
参考文献	27

第一篇 蒙古游牧文化变迁与草原生态重塑

题记	33
牧区社区的形成和特点	35
一、牧区社区的概念	35
1. 牧区与社区	35
2. 牧区社区与农村社区	36
3. 牧区社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	39

二、牧区社区的结构	40
1. 牧区社区的结构特点	40
2. 关于浩特	41
3. 关于牧民邻居	42
三、牧区社区的功能	43
1. 家庭小区	43
2. 嘎查卫星区	45
3. 苏木中心区	47
4. 外围区的辅助作用	48
四、牧区社区的成因	48
1. 草原生态和草原畜牧经济	49
2. 人口的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	49
3. 盟旗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	51
4. 家庭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和小牧家庭经济	51
五、对牧区居住方式演变的补充讨论	52
牧民家庭及其经济	54
一、家庭小区:地缘上扩大的家庭	54
二、牧民家庭经济:牧区经济社会史的新生事物	55
三、牧民家庭经济的形态:以牧为主的复合型生态经济	58
1. 以草立业	58
2. 以畜为本	59
3. 以林护牧	60
4. 以水保牧	60
5. 以农养牧	61
6. 家庭生态牧业与牧业生态	62
四、两性分工和雇工:家庭劳动力的转移与短缺	63
1. 两性分工的特点	63
2. 家庭劳动力的转移与短缺	65
3. 雇工成为普遍现象	65

青年牧民的生育观念	67
一、生育的性别观念:男女一样	67
1. 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67
2. 子女都可以养老送终	68
3. 子女都可以传宗接代	69
4. 子女教育一视同仁	70
二、生育的数量观念:男女双子	71
1. 没有多子生育观念	71
2. 不愿意接受独子生育观念	72
3. 持有男女双子生育理想	73
三、生育的质量观念:重视教育	74
锡林郭勒盟生态移民项目个案研究	76
欣康扶贫开发移民村	78
一、建村伊始	78
二、十年沧桑	80
三、两点讨论	86
1. “出来”与“回去”	86
2. 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89
巴音乌拉生态移民村	93
一、游牧终结,草场沙化	94
二、生态移民,两次搬迁	98
三、“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	102
四、草场恢复与再利用	105
五、未搬迁的嘎查和牧民	108
六、草场征用纠纷	111
七、养牛专业合作社——巴音牧场	114
八、定牧与游牧、圈养与放养的辩证	117
九、养牛业污染与有机肥料厂	120
十、玛这个人	122

草原生态重塑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的大生态观	126
一、完全赞成的观点	127
二、不完全赞成的观点	128
1. 指导政府决策的草地生态“科学”还不够科学	128
2. 通过减畜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和遏制生态恶化	131
3. 牧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性	132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135
引言: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	135
一、市场经济、服务业、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137
二、生态退化、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140
三、分散居住、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141
四、教育市场化和全球化、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143
参考文献	144

第二篇 兴安岭采猎文化变迁与森林生态重塑

题记	149
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演进	151
一、民族史与国家史的关系	151
二、鄂伦春族与国家关系的演进	155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析	158
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	163
一、鄂伦春族生产关系的变迁和特点	163
二、不同时期合作经济的异同	164
1. 地域“乌力楞”和“安嘎”	164
2. 互助组和初级生产合作社	165
3. 新经济联合体	166
三、“直接过渡”优劣得失再评价	167
四、鄂伦春族至今何以未能发展出普遍的个体经济	168
1. 自主能力和独立精神暂时丧失	169